

新中国中小学 教科书图文史

XINZHONGGUO ZHONGXIAOXUE
JIAOKESHU TUWENSHI

主编◎石鸥

外语



新中国中小学 教科书图文史

XINZHONGGUO ZHONGXIAOXUE
JIAOKESHU TUWENSHI

主编◎石鸥

副主编◎张增田 吴小鸥

外语

执行副主编

林立 吴驰 周宁之 张倩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 外语/石鸥主编.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406-9069-4

I. ①新… II. ①石… III. ①外语—中小学—教材—历史—中国—现代 IV. ①G6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0240号

丛书策划: 李朝明 梁耀凤 李敏怡
责任编辑: 苏洁 李杰静
责任技编: 涂晓东
装帧设计: 范霓 黎国泰
美术编辑: 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海南工商贸易区A幢)

889毫米×1194毫米 16开本 14印张 280 000字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6-9069-4

定价: 160.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15809

教科书的力量

田慧生

教科书是重要的启蒙文本。“教科书”一词，是19世纪70年代末由基督教传教士首先使用的。一般认为，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订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科书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实施的最主要载体，在学生个体成长中扮演了主导启蒙的角色。教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塑造人，但教科书毫无疑问是主要的塑造力量，这种力量的影响不是突发的过程，而是在教育的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缓慢地渗透进受教育者的生命中去。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人的回忆中，都明确提及教科书的影响之缘故。如钱学森回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指出：“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教几何的傅仲荪老师，自己编几何讲义。”^①莫言也曾指出：“我幼时失学在家，反复阅读家兄用过的《文学》课本，感到受益很大。我最初的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就是那几本《文学》课本培养起来的。”^②可见，从青少年的成长来看，教科书是他们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来源，影响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及创新能力的发展。在新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史上，教科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巨大存在，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直接的手段，在基础教育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教科书作为国家主流价值体系、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反映，其质量的好坏会影响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教科书的发展与改革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同时期的教科书承载着不同的启蒙使命，呈现出极为复杂变化的发展态势，但始终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割断这种历史的联系去孤立地看待和评价某一阶段的教科书改革，必然会使我们的结论失之公允和客观。基于这一认识，对新中国不同学科教科书的发展与改革的过程进行系统的回顾，阐明其“在历史之中”发挥作用，意义和价值都十分重大。

中小学教科书改革是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教科书的独特性决定了教科书改革与建设必须要有专业的学术研究引领编撰出版、实践探索、评价管理。进入21世纪之后，中小学教科书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以专家学者、专职人员、教师和教研人员结合的教科书建设队伍正在成长，以网站、杂志创办、专题会议举行及专项培训活动开展以及大量的教科书研究的论著的产生为特征的专业引领的系统正在形成。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小学教科书的研究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教科书成为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人们从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出版学等角度关注教科书的历史变迁、多样发展、实验探索、本质特性、价值取向、内容选择、结构设计、体例变化、文化构成、审定管理、质量评价等等，大批的专著与论文不断涌现，形成教科书理论研究的一个小高潮。成绩显著，形势喜人。但中小学教科书建设仍然面临诸多复杂、艰巨的困难和问题，与正处于伟大复兴时期的中华民族对基础教育的需求、与互

① 钱学森. 北师大附中的六年[N]. 光明日报, 2007-12-03.

② 莫言. 虚伪的教育[J]. 书摘, 2006(5): 60.

联网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与人才的多元化发展的需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一个有效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不同学生发展的系列化、立体化和现代化的教科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多样化格局下的教科书的特色，教科书建设的民族性、本土性、国际性的充分结合也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教科书的精致化还很不够，整体的教科书品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教科书的法制化建设、教科书的选用机制的完善等等都有待加强。为此，研究的任务还非常艰巨。为孩子而研究，为未来而研究，研究今天的教科书，研究明天的教科书，都离不开对教科书的昨天的深入了解。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丛书就是我们了解教科书的昨天的一个重要窗口。该套丛书是石鸥教授教科书研究团队近年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石鸥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搜集散落在民间的一本本教科书，并逐步聚集起一批热心者，组建了教科书研究团队，开始了系统性、专业化的研究。石鸥教授的教科书研究团队最早以教育部湖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为平台，从知识社会学等角度对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知识准入、控制与教化、空无内容等理论问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2005年之后全面展开了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整体梳理与研究。2010年后，石鸥教授的教科书研究团队移师首都师范大学，目前已有基本研究人员数十名，学术背景涉及教育各领域，成员分别来自北京、香港、湖南、浙江、江苏、山东、重庆、广东、广西、陕西、辽宁等全国各地。近十年来石鸥教授的教科书研究团队成果丰硕，已经出版学术专著及教科书研究丛书《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等20多本，在《教育研究》、《教科书研究》（台湾）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目前石鸥教授教科书研究团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等二十余项课题，成果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国家及省部级奖项十余次。石鸥教授从2013年开始每年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两岸四地“教科书研究”论坛、出版《教科书评论》等，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丛书由语文、数学、外语、文科综合、理科综合、音体美组成，丛书作者基于历史经验、现实观照与未来憧憬的学术建构，既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梳理了中小学主要学科教科书60余年来的发展演变过程，更透过不同教科书知识的选择、话语的表达、插图的构成等，让我们感受到新中国不同时期基础教育发展、改革与实验的诉求和启蒙力量。这套丛书体系完整、结构严谨、资料翔实，基于实物的大量的教科书图片，既记录着新中国教科书直接的、鲜活的、详细的发展历程，也展现了丛书作者的严谨的学术态度：研究教科书一定要基于教科书实物，一定要见教科书。读该套丛书，可以对我国基础教育教科书60多年的发展脉络有较完整的理解与把握，可以为教科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基础。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丛书关注到少数民族教科书的发展，关注到不同版本包括许多地方教科书，关注到大量实验教科书。它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新中国教科书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这套丛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教科书研究又上了新的台阶，同时也标志着我国课程教学论的探索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石鸥教授团队的研究开拓已有效地进入到课程教学论的重要领域，而长期以来我们的课程教学论研究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是不够的。

60多年，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但这60多年中小学教科书对于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来说，又显得非同寻常。作为石鸥教授二十年的老朋友，由衷钦佩他在教科书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著成就。作为教科书研究和管理的一员，衷心感谢石鸥教授及其教科书研究团队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他们为中国教科书建设所做出的基础性、创新性的贡献。是为序。

2015年4月15日于北京

（田慧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

序

石鸥

作为弘扬中国文化的核心渠道、见证社会变革的重要载体、传播科学知识的基础工具、形塑青少年心灵的启蒙文本，中小学教科书以其丰富与神奇的魅力，持续地吸引着我们的目光。

这里，我们将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示这种独特文本在新中国的发展轨迹。

南宋史学家郑樵曾在《通志·图谱略》中谈到图文结合的价值：“左图右史”，“索象于图，索理于书”。足见图对学理呈现的重要性。《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以时间为经，以学科为纬，粗线索，小书本，以文领图，以图辅文，分语文、数学、外语、综合文科、综合理科、音体美六册。六册书卷在翻动中飘逸，犹如一个接一个地打开六个窗口，从六个视域管窥新中国一代代学童所琅琅诵读过的文本变迁历程。六个窗口“多棱镜”般地映照出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成人世界对待知识的态度与智慧，对待未来的憧憬与梦想，当然，也映照了这个社会与世界本身的变迁。

新中国变迁时时刻刻在发生，教室里的阅读分分秒秒在进行。大而言之，教育变革可以划分为新中国17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被各科教科书那或素淡或浓烈的书影所映照。

（一）17年：全面统一与规整教科书的阶段（1949—1966）

这是迅速结束旧政权一切教科书的时期，是用全新的教科书占领课堂的时期。1949年前教科书的遗产和传统对革命者而言只能束之高阁。革命者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大的力度，完成用统一的新政权思想与话语的教科书取代过渡过来的包括国统区、根据地解放区等各种背景的教科书的重任。旧的遗存荡涤一空，新教科书横空出世。这一时期，新中国教科书出色地化解了社会急剧转变后带给人们的震动、不安与茫然，引导人们对正在兴起的共产党政权的发自内心的拥护。这一时期的教科书，没有柔情没有多元，它们不主张个性不主张私己，它们呼唤群众运动，渲染跃进、高昂、激情，灌输统一、集体、阶级，梦想与现实在教科书中浑然难分。

在整个1949—1966这17年里，教科书编撰者们经常面临各种困惑、困难与压力，来

自不同力量（比如苏联与本土、解放区与国统区教材）的博弈没有消停过，这些博弈又微妙地影响甚至主导了17年教科书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时间段里，来自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它的冲击下，曾经让本土的教科书（甚至教科书的最高管理者）尽失颜面，地理教科书作检讨、物理教科书作检讨、文学与汉语教科书的兴衰、五年制小学教科书的退出等等，都与苏联教科书的强势影响密切相关。一个时间段里，教科书的放权与实验如出闸的洪水奔腾向前，地方教科书、乡土教科书、各种学制实验教科书全面开花，在17年统一、通用、国定教科书高歌猛进的路途，闪现了不长时间的一段难以忽略的、余味无穷的风景。这些探索给教科书建设带来了全新的主题、叙事方式、文本语言与编撰模式。从整体来看，17年留给教科书发展史最重要的印记之一，是教科书集权与规整的力度空前，它所向披靡，自有现代教科书以来第一次全面清除了中央官方教科书以外的几乎所有教科书，一切非官方教科书都被逐出课堂。民间教科书的彻底退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退出。

这样一种高度控制和垄断教科书的策略势必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某些问题纠缠了我们半个世纪，而且还会纠缠下去。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弱化了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权威性，过度强化了教科书的作用；二是无法适应千差万别的地方和学生差异，导致教科书难度容量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教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举措犹如风中芦苇，一刻也没有停过摇摆，一刻也没有均衡过，历届教育部没有摆脱这个阴影的缠绕，最显著的证据是教育部为调整教科书难度容量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颁发文件。

（二）“文革”：课本革命与革命课本的十年（1966—1976）

这是对正统意义的教科书进行彻底革命的时期，是全面构建红色革命课本的时期。对于受教育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十年“文革”教育是历史记忆中最难以忘怀的部分。那些红彤彤的课本是那么标新立异，在全球教科书史上定格了一个时代。红彤彤的课本是那个时代革命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具象。它把意识形态的演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把革命课本的渲染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文革”课本激进而无所畏惧地尝试着学科的综合、知识与生产的结合、理论对实际的结合（迎合）；“文革”课本因其生产者的平民性（工农兵）和内容的应用性，使得“教科书”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平民化，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去权威性；“文革”课本封面和插图人物男的高大勇猛，女的丰满威武，适应特定的政治美学需要，也构筑了特定的教科书政治美学。红彤彤的课本成了非常年代的特殊文化现象，它构建了崭新的一种教科书样式——一种革命版教科书。这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教育理念的标本，这一标本是对传统经典教科书的彻底革命或否定，尽管这一标本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嘎然而止，但它的方方面面：它的样式是那样的鲜明独特，它的话语是那样标准化且充满着火药味，它结构的雷同和奇特，它的生产者那平民化阶级性的身份，以及它关注生产关注现实的精神（即便是那样的极端和功利），都具有教科书史甚至教育史的经典意义，遗憾的是这一意义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三）改革开放后的教科书逐渐多样化时期（1977—今天）

这是教科书专一与多样微妙博弈的阶段，是中央与地方均衡教科书权力的阶段，是最终初步形成了在统一要求下的教科书多样化格局的时期。以20—21世纪之交为界，这又大致可以细分为两个亚阶段。

20世纪80—90年代，教科书发展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程。既有生机勃勃的局面，如八套半教科书的改革、实验教科书、地方教科书和乡土教科书的迅猛发展等（遗憾的是，这

个局面没有延续下来，更没有被发展完善）；也有相对单调的时期，因为每当社会发生变革或动荡，总会迅速影响到教育，而教育上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教育内容的变化，这就必然集中体现在教科书的变化上（1990—1991年前后出现的大规模补充教科书，就是教科书发展史上少有的非常态现象）。整体上，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的教科书仍然具有明显的两大特性：一是泛政治性，二是一定的垄断性单一性。多样化的尝试缺乏制度设计与保障，即便是偶尔的、短暂的教科书多样化努力，也在所谓通用的、统一的、“国家的”教科书等权威性说法面前显得过于弱小，导致一段时间徘徊在没有为教科书制度史留下特别值得可圈可点的贡献的局面。

进入21世纪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席卷全国，课程改革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从制度上把以教科书多样化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改革推上了新的平台。教科书建设实实在在地往前迈了一大步。过去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纲一本”的局面被打破，以多样化标志在教科书发展史上有声有色的一幕掀开了。在新世纪课程改革中看到的一幕，只有在20世纪初教科书发展黄金时期才似曾相识，才有这么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教科书发展行列，才调动起社会如此庞大的能量加入到教科书的建设之中，才让这么多学者专家如此微观如此细致地关注到课堂关注到学生。百年前教科书发展的一幕于不经意之间再次在百年后掀开。只是，如果从外在来看，这是一出在统一要求基础上的多样化的大戏，帷幕才刚刚拉开，是否精彩，还看我们的共同努力。由垄断的打破到多样化的启动，确实是一次大跨步的前进，但启动容易，突破难，真正意义的多样化还在朦胧成型的过程中，教科书领域尚未出现风景绚丽的局面，多样化的建设还任重道远，前行中的曲折与反复也许说来就来。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多样化的趋势已经显现，社会土壤已经形成，浩荡的时代潮流已经很难逆转。

翻阅着60多年来的小小课本，犹如观看一出没有结局的连续剧。

在这出连续剧里，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教科书曾经热衷于培育信仰、形塑思想、期盼理想，歌颂新的领袖与国家，建设新的社会与生活，对历史的继承与人性的尊重不太关心（这在60—70年代达到极致），那么往后、往后再往后，到了21世纪，我们的教科书似乎对培育信仰、形塑思想、期盼理想之类的心灵培养本能地产生逆反，没有强大的兴趣了。我们往另一端走去，以追求个性的名义。新世纪教科书的坚定开放和稍许迷惘的躁动同时出现，并同样引人注目，这是一个要求较低限度的精神淬炼和鼓励最大限度的自我张扬的教科书时代，人心的敬畏和震撼少了一点，但充盈着对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的关照——在教科书史上似乎还是头一回。对它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只能拭目以待——等待续集的陆续上演。

但有一点很清楚，儿童读的书不是小玩意儿，它关乎一个人的一生，关乎一代人的一生，更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一种文化的本质及其传承。美国儿童文学家贝琪·B·雪利提出一个观点：“如果能够记录有史以来美国青少年读了什么书，就能多少弄清楚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借用该说法：如果能够透彻研究新中国以来中国青少年读了什么教科书，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理解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

为了透彻研究1949年以来，我们的年轻人到底读了什么样的教科书，我们首先必须从最基本的层面对新中国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作系统梳理。所谓最基本层面的梳理，首先就是对当今中小学基本科目的教科书的梳理，它包含语文、数学、外语、综合文科（思想政

治、历史和地理)、综合理科(物理、化学和生物,以及小学段的常识或自然)、音体美。这是我们的定位。所谓最基本层面的梳理,其次就是以梳理发展脉络为基本任务,为读者提供新中国教科书的发展脉络与“足迹”。我们认为,教科书的发展脉络与足迹,不仅仅是所谓主流教科书留下的,它是繁复多样的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的曲折迂回的轨迹。各种相对边缘的、相对局部的教科书都印上了它们发展的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痕迹,汇成了中国教科书发展的大流。无视那些所谓非主流、不畅销的教科书,就不是真正的教科书发展史。教科书发展史是由中小学各种教科书共同构成的历史,仅仅“主流”、“畅销”是不能够准确反映教科书的历史的,正如“主流艺术”、“畅销小说”不能代表艺术和文学的历史一样。正因为本丛书把梳理发展脉络作为主要任务,对具体教科书的全面评析就少有兼顾。所谓最基本层面的梳理,再次就是旨在使读者对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经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与判断,为我们下一步的教科书建设与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平台,以及某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避免犯本可以避免的低级的错误,不至于忽视最不应该忽视的问题。

本丛书对于教科书发展轨迹的梳理,和我们的一贯研究一样,不见文本不下笔,至少是要慎下笔。我们看重甚至依赖教科书实物,所以我们借助自己所藏的教科书实物,以图文史的方式来勾勒新中国教科书发展脉络。我们很难想象离开教科书实物的教科书脉络的梳理,就好像中国的小说史、诗歌史、电影史一样,离开实物,一切都是浮云了。尤其是教科书,它和其他任何文本不一样,因为其他文本都有独一无二的命名,再加上独一无二的作家,一提起某某人的某某书,大家就有明确的指向性,绝不会犯晕,研究者和读者会在同一文本上展开对话。唯有教科书,这是命名高度雷同的文本,我们说语文,说数学,几十年上百年一直这么说,成千上万的、天壤之别的文本都是这个命名,即便是同一家出版社的语文、数学,都是翻来覆去的同一命名,这是让人眩晕的命名,是让研究者和读者很难迅速在同一文本上展开对话的命名。如果不展示文本的实物图像,很容易让人云里雾里一时半会绕不出来,所以这是我们研究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征。适当地展示教科书图像、展示教科书封面,让读者能够比较清晰地知道我们在说哪一种教科书。

翻阅还不太遥远的新中国不同时代的教科书,追寻一本本薄书所凝固的历史瞬间,发生过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不同时代的人,对不同教科书所勾画出来的认知体系和价值判断,会有一番意味不同的体悟。大半个世纪里教科书那巨大的思想跳跃、强烈的感情起伏、悬殊的主题差异、迥异的文字风格,都是我们难以忘怀的,也不是一本书几本书可以说得清理得明的。必然,我们的有些认识是片面的甚至肤浅的,遗漏也是难免的,我们为自己的才疏学浅而诚惶诚恐,但我们会不断探索不断求知,为了那小小的薄薄的但又是沉甸甸的影响深远的教科书。因为,它们是孩子们的精神食粮!

我们要感谢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代表的,许许多多在新中国60多年的语文、数学、外语、思品、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音乐、美术、体育以及各科目教科书的编撰、出版、发行与研究上的辛勤耕耘者,他们的智慧与劳动既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最重要的平台,特别是为千百万学生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健在的绝大多数人(至少70岁以内所有的上过学的人),都是咀嚼着这些精神食粮长大的。这是让人唏嘘不已的奉献,由衷地敬仰他们!

我们要感谢广东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在启动时就意识到这套书的价值,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并促成了本丛书的出版;感谢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他们的谦和友善,他们对本丛书的辛勤付出都让我们敬佩不已。

我们要感谢中国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心主任田慧生教授，当他得知此丛书即将出版时，欣然应允为该丛书写序。实际上，作为课程教学论的博士，田慧生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教科书的几个学者之一，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的研究成果一直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参考。目前无论是他的管理工作还是他的学术研究，仍然密切与教科书相关。我们把他的鼓励，视为重要的学术鞭策。

我们要感谢来自全国的本项目的教科书研究团队，他们以自己的智慧与辛勤，为本丛书的完成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本丛书由石鸥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负责，吴小鸥教授（宁波大学）、张增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协助共同策划、组织和具体实施。石鸥教授还把自己的藏书无私地贡献出来，供来自全国各地的作者们翻来覆去地翻阅、比对、照相……为了这套丛书的完成，他们付出的艰辛是很难想象的。

吴小鸥教授与王昌善教授（重庆师范大学）、刘丽群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刘景超博士（长沙女子大学）等在语文分册上付出了特别的辛劳，刘学利博士（沈阳师范大学）协助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张景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与方成智教授（湖南农业大学）、李新副教授（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钱劲老师（长沙第一中学）的主要付出是在数学分册上，崔珂琰博士（西藏民族大学）协助做了大量工作；林立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与吴驰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周宁之博士（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张倩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等主要负责外语分册；李祖祥教授（南通大学）、段发明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石玉博士（泰兴学院）、雷冬玉博士（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等主要负责综合文科分册，廖巍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协助查阅、核对了大量资料；综合理科分册由赵长林教授（聊城大学）、李永平博士（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心）、陈文新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张菁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等具体负责；音体美分册由蔡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邓兰副教授（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刘斌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王悠（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具体负责，孙凯老师（北京工商大学）协助做了大量基础工作；除了各册署名的编撰者外，为本丛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很多辛劳的还有刘毕燕、宿丽萍、张学鹏等研究生，魏天飞、曾冬平、周美云等研究生也参与了部分资料的查询与整理等工作。真诚地感谢他们。

我们还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提供的各种方便与支持，感谢劳凯声教授、孟繁华教授，感谢课程教学研究所的同事们的理解与帮助。

本丛书是全国教育规划国家社科课题“百年中国教科书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基础作用”（BAA120011）的研究成果之一，同时也是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之一。

教科书启蒙的力量绵柔如水滴，柔嫩如春笋，但水滴可穿石，没有什么比它的力量更强大了，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柔嫩春笋向上，向着阳光。这神奇的启蒙之书引领我们缅怀六十多年曾经走过的路、反思正在走着的路以及憧憬伸向未来的路。这有利于使我们的研究始终保持一种“在路上”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磕磕绊绊而又永不放弃、执着前行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期待更多的批评、更多的帮扶的精神状态。

2015年7月9日
于首都师范大学

目录

Directory

概述 / 1

第一章 “苏化”时期的外语教科书 (1949—1957) / 13

第一节 书坊出版的外语教科书 / 15

- 一、外语学习以俄语为主 / 15
- 二、外语教科书没有上教科用书书目 / 16
- 三、书坊出版的各类中学外语教科书 / 17

第二节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与外语教科书的统一 / 29

- 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 / 29
- 二、外语课的设置、取消与恢复 / 30
- 三、外语教学大纲的颁布 / 33
- 四、《英语》教科书 / 33
- 五、《俄语》教科书 / 36

第二章 全面探索时期的外语教科书 (1957—1966) / 38

第一节 “大跃进”时期的外语教科书 / 39

- 一、外语教学中英语俄语比例的调整 / 39
- 二、中学外语教材座谈会召开 / 41
- 三、教科书编写出版权限的下放 / 42
- 四、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语教科书 / 43

五、各地编写的适应学制改革的外语教科书 / 48

第二节 十年制外语教科书 / 51

一、十年制学制对教科书的要求 / 51

二、人民教育出版社十年制《英语》、《俄语》课本 / 52

第三节 十二年制外语教科书 / 56

一、关于外语科的一些新规定 / 56

二、《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的颁布 / 58

三、《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的制定 / 59

四、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中学外语教科书 / 60

五、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外语暂用课本 / 62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语教科书(1966—1976) / 65

第一节 “复课闹革命”阶段的外语教科书 / 66

一、“停课闹革命”——“文革”初期之教育与课本 / 66

二、“复课闹革命”及其英语课本 / 68

三、各地《俄语》课本 / 91

第二节 “回潮”与“反回潮”阶段的外语教科书 / 94

一、教学中对基础知识的短暂强调 / 94

二、“批林批孔”运动的蔓延 / 96

三、“不学ABC,照样当接班人”的观点泛滥 / 97

四、各地中学试用课本《英语》 / 98

五、各地中学试用课本《俄语》 / 113

六、其他少数语种课本 / 115

第四章 外语教科书的恢复、探索与改革(1976—2000) / 117

第一节 外语教科书的拨乱反正(1976—1981) / 120

- 一、外语教科书的过渡 / 120
- 二、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科书 / 126
- 三、全日制十年制俄语课本 / 132

第二节 外语教科书的全面改革 (1982—1985) / 133

- 一、十二年制学制的恢复与中小学教学计划的调整 / 133
- 二、外语教学研究的深化 / 134
- 三、《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英语教学大纲 (征求意见稿)》 / 136
- 四、修订的五年制小 (中) 学课本《英语》 / 137
- 五、供高中起点学生用的三年制《英语》课本 / 139
- 六、高级中学暂用课本《英语》 / 140
- 七、中小学俄语、日语教科书 / 140

第三节 全面推进义务教育时期的外语教科书 (1986—2000) / 142

- 一、九年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 / 144
- 二、高级中学外语教科书 / 153

第五章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时期的外语教科书 (2000—2011) / 156

第一节 课程标准外语教科书 / 157

- 一、课程标准外语教科书概览 / 158
- 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 161
- 三、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 / 184
- 四、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俄语》 / 191
- 五、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日语》 / 193

第二节 修订教学大纲及实验外语教科书 / 196

- 一、义务教育阶段外语教科书 / 197
- 二、高中修订教学大纲的外语教科书 / 206

概述

Outline

对人们而言, 外国语是相对母语来说的。外国语的学习不仅能扩宽我们的思路、扩大我们的视野, 而且还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了解其他文化的窗户, 更能够为我们学习与借鉴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提供重要保障。文化交流的过程是一个参照、比较、吸收和互补的过程。无论是对外国文化进行鉴别还是融合, 都必须建立在对外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真正理解的基础之上。而外语学习则是基础中的基础。

外国语教科书是外语学习的重要媒介, 它不仅能帮助学生了解外语的基本知

概述



识、所使用的环境和范围,而且能够使学生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生活背景,拓宽个人的视野。学生通过对外语教科书的学习,能逐渐了解外国的词汇系统、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并进行适当的评价和分析,以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张力。外语教科书为学生提供思考和审视自己的世界观的参照系,这对于学生思考全球化与本土化、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在外语的学习中,教科书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现代意义的教科书一般满足如下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出版;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课教学建议,每课有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依据教学计划规定的学科分门别类地编写和出版。我国系统的大规模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外国语教科书,是在1903年之后伴随着癸卯学制才出现的。但是与外语教学相关的用书早就出现了。1835年,广州、香港等地的传教士和商人组织了“马礼逊教育协会”,为中国儿童教习英文等课程。鸦片战争之后,大量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除了传教之外大多数还兼办教育,为中国儿童教习“西文”。1862年7月,京师同文馆成立,标志着中国正规英语教学的开端。同文馆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只设英文馆,后来规模逐渐扩大,陆续增设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馆等。在普通教育阶段,外语语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见于1902年8月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在中等学堂规定开设“外国文”。^①1903年颁布并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在中学堂出现“外国语”一科,并标明了“日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②1912年1月19日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在初等小学没有开设外语课,但在高等小学10门功课之外,说明“视地方情形,得加设唱歌、外国语、农、工、商业之一科目或数科目”^③,中学继续开设有外语课。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外语语仍然受到重视。伴随着外语教学,早期教会学校及各家书坊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了大量的外语教科书,被广为流传。“外语教科书的普及,使得近代中国人获得开阔的文化思索空间,拓展了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参照系统。”^④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不同时代外语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小学外语教科书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编写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中小学外语教科书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新中国外语教科书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教育改革而变化,既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又受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以及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所制约。新中国中小学外语教科书在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的辛勤耕耘和精心研制下,不断克服困难,走过了值得大书特书的60年。

①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375-376.

② 同上书:383.

③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3.

④ 吴小鸥.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启蒙诉求[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150.

一、“苏化”时期的外语教科书（1949—1957）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指出：“人民政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①根据这一精神，人民政府自成立以后就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建设新型教育。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强大的苏联无疑是最快捷的方法。从1953年起，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各行各业迅速兴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教育也紧跟政治经济的发展作出相应的变动。教育部门提出了口号：为了胜利地完成教育建设工作的任务，首先要加紧学习苏联的先进教学经验。^②为了培养俄文干部，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俄语教育备受重视，一股俄语学习的热潮随之兴起。1954年4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明确规定：“改进中学的教学工作，必须学习和吸收苏联的先进教育理论与教育经验。”^③所以，在这一阶段，外语教科书从各家书坊自行编印出版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统一，都以学习苏联为特点。

1949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教科书问题的批示》，指出今后全国各地用教科书，除一部分小学教科书有地区差别之外，均应在可能条件下要求一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总署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办法，一是在统一编辑的教科书尚未编成之前，先由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会同拟订中小学教科用书目录，发到各大行政区的文教部（教育部），规定中小学教科书必须统一采用目录中所列各书；二是成立国家统一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门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由其组织力量，新编中小学各类课程的教科书，新教科书编成后，一律使用新编的课本。

1950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正式颁发的第一份中学教学计划。其中，对初、高中的外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外语课程初、高中均设置一种，如有师资、教材等条件宜设置俄语，但已设置英语的学校和班级仍应继续教授英语，不可中途变更。不具备俄语条件的学校亦宜暂授英语。由此可见，新中国政府在初期对于外语的教学是比较重视的，特别是俄语教学。根据这个教学计划的要求，新中国外语教科书迅速发展起来。

1950年3月，出版总署决定将“各级学校教科用书”列为当时国家出版机关的首要任务；同年7月，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发布了《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④，但这张教科用书表中没有外语教科书的规定。这说明当时还没有编写出统一和通用的外语教科书，也没有被中央政府完全认可的外语教科书（实际上，在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发布的

① 有林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一卷）[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426.

② 人民日报[N]. 1953-01.

③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G].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05-306.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 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年）[G].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存，1958：226.

《1951年秋季中小学教科书用书表》中仍然没有外语教科书，说明当时的外语教科书还是没有被中央政府认可）。

当时的情形是，或许外语教科书还来不及统编或没有很合适的，而学校又急需，于是各家书坊根据新的形势，从1950年开始，对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外语教科书进行了修订，新编出版了不少英语及俄语教科书，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林汉达编写的《（初级中学用）标准英语读本》及《高中标准英语读本》（中华书局），丁秀峰编写的《新编初中英语》（商务印书馆）等。

从1952年开始，国内掀起了一场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直接给英语教育罩上了一层阴影。中央政府也进一步指示要加强俄文教学，培养俄文干部。1952年3月，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文化教育政策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教育部公布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在该草案的教学计划中要求“外国语一科，各校得视具体条件，教授俄语或英语”。1953年8月至1954年7月试行《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仍要求各校视具体条件教授俄语或英语。这个时期的俄语教材以《俄文初级读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初中俄语读本》及《高中俄语读本》（时代出版社）等为代表。

与此同时，教科书的统一工作也迅速进行。1950年9月，出版总署召开全国出版会议，会上提出中小学教科书必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由出版总署和中央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编写国家统一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教科书的发行改由新华书店总店课本发行部负责。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设有中小学各学科编辑室。中央人民政府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十分重视，毛泽东主席亲笔题了社名，任命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人教社的社长、总编辑。从此，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出版工作逐渐归于统一。

1954年4月，教育部下达了取消初中外语的文件——《关于从1954年秋季起中学外国语科设置的通知》，提出：“初中一般不设外国语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减轻初中学生学习的过重负担，使他们能更好地学好本国语文和其他学科。”在1955年6月教育部颁布的《1955—1956学年度中学授课时数表》中，初中外国语一科已被取消，高中则每周安排4小时。

这种情况直到1956年1月第二届政协二次会议的召开才开始发生改变。周总理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规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同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制定规划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过多地缩减西方语音（特别是英语）的教学对于国际交往和国内建设都是不利的；与此同时，通过几年的时间，发现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并不能奏效。因此，1956年7月，教育部发出《关于中学外国语科的通知》，并指出“从1956年秋季起，凡英语师资条件较好的地区，从高中一年级起应增设英语课；高中二、三年级原教英语的更应该继续教下去”，“从1957年秋季起，初中一年级开始恢复外